

美国的中国
近现代史
研究

胡大泽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的中国
近现代史
研究

• 胡大泽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胡大泽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

ISBN 7-5004-4789-2

I. 美… II. 胡…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5025号

特约编辑 张瑶均
责任编辑 张小颀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插 页 2

字 数 340千字

定 价 2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胡大泽教授是我的学长，20世纪50年代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师从王棡教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并留校任教。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后来他因为家庭困难调回家乡四川，仍在高校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他长期关注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状况，并不断提出一些个人见解。现在他把这些研究心得整理出版，不仅使人们对美国的研究状况有进一步了解，而且对促进中国、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是有益的。

众所周知，早年，欧洲的汉学家曾对中国的历史、文学、思想文化作过许多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中国的重心从欧洲转到美国。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政治格局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它不仅注意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而且更加关注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美国设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也在许多大学设有研究中国的学术中心。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都是享誉学界的著名研究机构。许多大学收藏着丰富的中国图书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各大学培养出一大批研究中国的高级人才。他们以其独到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编写出一部部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教授，是国际史坛的著名史家，他生前领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

书,组织一批研究有素的各国史学家,就各类专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在各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尽完善,甚至对中国的看法还有某些偏见或偏颇,但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研究视野,对中国问题提出的种种见解,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我们必须加以区分和鉴别,从中吸取有益的研究成果。

胡大泽教授的大作《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图景。他分析了美国对华研究的发展历程,介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剖析了美国学者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模式,介绍了一批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著作。这是一项很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对我国学者扩大学术视野有较大助益。我们祝贺这部作品的出版。

张宪文*

2004年4月29日于南京大学

* 张宪文教授是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兼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前 言

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

美国为了适应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全球战略的需要,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各种基金会的资助,创建起一些研究机构,招揽各方人才,运用较丰富的史料,采用先进手段整理资料,分工合作,发挥各机构的专长,使其对中国的研究不断有所创新发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在介绍近两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建立、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展示了美国从创建中国学到重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窥见美国的历史科学是如何为它的社会经济与全球战略服务的,同时,了解其主要研究机构、研究的学派与发展趋势,可供我们进行对比反思;了解其各派史学观点的形成、演变及其研究的理论与模式,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通过本书对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简介,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论点、中西史学的异同与可融会之处,而且还可以了解美国是如何从多角度多视野剖析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求“洋为中用”。也使我们能够掌握应予辩驳澄清之处,可供借鉴吸取之处,可供引进发扬之处。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融合多元文化之精粹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文化思想的交流日渐发展,美国对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会更加深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亦不能滞后。虽然拙作难免有偏颇和遗漏之处,但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各章互有关联又可独立成为专论,既可以增进我们对美国的科学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的了解,又可以促进中美文化思想的交流,进而还可以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昂首阔步走向世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供有益的借鉴。故本书不只是史学论著,而且是可供了解美国的文化思想之作。

本书附录了美国收藏中文资料的主要单位、备查的论著目录及主要征引书目与资料来源,供读者检索查阅。

胡大泽

2003年11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研究的发展历程	(1)
一 18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	(1)
开始重视了解中国的阶段(也可称为“传教士的 业余活动阶段”)	(1)
二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2)
“中国学”初步建立的阶段(也称为“科学职业化 阶段”)	(2)
三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3)
由中国学逐步进入中国史研究(主要是以近代史 为重点)的阶段(其队伍由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向 专业人才过渡)	(3)
四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	(5)
转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阶段(是“历史学和中 国学平行发展、自觉成熟与合并的阶段”,也是 “历史知识信念的复兴”和“富有生气的”阶段)	(5)
五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	(6)

2 美国的现代史研究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进入了深入了解“敌情”， 以便制定战略与策略的阶段	(6)
六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11)
重视研究当代中国的跃进阶段	(11)
七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12)
呈现研究当代中国的阶段	(12)
八 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	(16)
逐步形成多角度多视野研究当代中国的 阶段	(16)
第二章 研究的资金与机构	(33)
一 提供资助的基金会与财团	(33)
二 奖金与研究金	(38)
三 设在各大学内的研究机构	(41)
四 主要研究机构	(53)
五 设在美国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机构	(64)
第三章 研究的学派及代表人物与发展趋势	(67)
一 费正清	(67)
二 芮玛丽、许华茨、鲍大可、费维恺、施坚雅、 珀金斯等	(83)
第四章 研究的理论与模式	(99)
一 “挑战与应战”(Challenge and Response), 即“传统 与近代化”(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模式	(100)
二 帝国主义模式和“依附论”(Imperialism Model and Appendags)	(103)

三	历史遗产论(Historical Tradition),也称“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	(105)
四	交互作用观(Response Each Other)	(106)
五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心观在美国兴起	(107)
六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	(115)
第五章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著作略评		(127)
一	马士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28)
二	莫里斯·迈斯纳与《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人民共和国史》	(130)
三	石约翰与《中国革命的透视》	(141)
四	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	(146)
五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155)
六	斯诺与《西行漫记》	(163)
七	斯诺夫人的《斯诺眼中的中国》	(167)
八	孔飞力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69)
九	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175)
十	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	(193)
十一	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	(195)
十二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199)
十三	迪特默的《刘少奇》	(204)
十四	泰维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206)
十五	戴维·W. 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209)
十六	汤森的《中国政治》	(213)

美国的中國近现代史研究

十七	易劳逸的《蒋介石与蒋经国》	(222)
十八	伊·卡恩的《中国通》	(225)
十九	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230)
二十	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237)
二十一	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243)
第六章	美国中国学(重点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 及部分论著列述(1784—2002年)	(260)
附录		(372)
一	收藏中文资料的主要单位	(372)
二	供查阅的论著目录	(383)
三	主要征引书目与资料来源	(405)
后记		(411)

第一章

研究的发展历程

首先应弄清楚,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能够达到目前的成果,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美国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所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可以反映出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显示出美国的文史学科是如何与时俱进,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构建新史学,为它的政治与全球战略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从中窥视到近两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建立、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及其前景。这一点也将给我们带来教益与启示。

具体说来,美国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 18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开始重视了解中国的阶段(也可称为“传教士的业余活动阶段”)

美国于1823年成立“皇家亚细亚学会”,标志着开始重视了解中国与亚洲,1834年刊印《皇家亚细亚文化报》,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是由于美国想扩大海外贸易,必然要同中国交往,打开这个广阔市场,因而需要对中国进行研究;“中国学”(Sinology)便随之兴起。首先由传教士在其中起开拓作用,逐步形成“教会

史学派”。

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裨治文(E. C. Bridgman)。他于1830年首次踏上中国国土,不久便担任了外交官。他于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又称《澳门月报》),自任主笔,该报以报道中国的历史、风俗和时事为主要内容,是第一个美国关于“中国学”的杂志。1833年来华的是卫三畏(S. W. Williams),先是协助办理《中国丛报》,后来担任美驻华使馆参赞,被认为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1848年,由卫三畏主持出版了裨治文撰写的《中国总论》两卷,其副标题是“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等及其居民概况”,堪称美国人研究中国学的里程碑。现已译为多种文字。

1843年裨治文倡导在美国建立“东方学会”,会员包括在近东、印度和远东的传教士。它是“中国学”处于萌芽阶段的组织。其宗旨是“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随即又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丛刊和翻译丛刊,并设有图书馆。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顾盛与伯驾都是《东方学会》的会员。

二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中国学”初步建立的阶段

(也称为“科学职业化阶段”)

美国人在这一时期开始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并建立起相关组织,“创立了微观中国学的传统,它从中国的考证学取得了营养”。但是,这时美国的“中国学”是远远落在英法等国之后的。美国便采取广泛吸取英法成果的做法,并争取国外学者为其从事研究。将历史作为一种科学的概念,是19世纪末才在美国流行起

来的。

1861年“北京政变”后，美国于1869年从清廷恭亲王奕訢那里获得他所赠予的数万册书籍。这更进一步地奠定了美国研究中国的基础。1876年，耶鲁大学首创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1884年开设汉语与中国文化课程。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开设汉语课。随即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先后设汉语教研组，开设汉语课，开始教授中国的文史课程。随之，美国的首批汉学家出现了。

另一方面，由于传教士来华日渐增多，大大促进了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因而有助于中国学的形成；与此同时，这一批人对中国史也开始重视起来。美国来华的传教士，1875年已超过200人，1898年竟达1500人。他们一方面收集并研究中国的资料，一方面在华传播西方文化。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第一所西学，后来迁到杭州改称之江大学。美国人丁韪良(W. A. Martin)1850年来华，到宁波传教；1865年起，任同文馆总教习达30年，后来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撰有《花甲记忆》、《中国之觉醒》等书。1882年，美国人李佳白(Gilbert Reid)来华，结识了清廷官僚，组织起尚贤堂。1863年，卫三畏(S. W. Williams)的《中国商业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出版。

三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由中国学逐步进入中国史研究

(主要是以近代史为重点)的阶段

(其队伍由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向

专业人才过渡)

这一阶段美国对于中国学的热情，反映了美国积极对外扩张

的迫切性,其宗旨在于为其“门户开放政策”服务。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逐步设置科研机构,积累资料,建立队伍。最初,中国学的发展尚不快捷,但到19世纪20年代当各方提供了研究资金时,研究随之蓬勃兴起。研究者提出“写作的历史是一种信仰的产物”,史学论著也多种多样地出现。到30年代,美国历史协会会员已达3500人。

19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中文教研室;哈佛大学与国会图书馆开始收藏有关中国的图书文物;同时在华传教士多已成为美国政策的献策者和观察哨兵。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丁韪良等提出保留清光绪帝等诸多对策,获得采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乘机大力扩张在华势力。1901—1911年间,美国“汉学家”到中国收购了3万册图书,作为回国研究之用。从20世纪20年代起,为了适应向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为研究中国提供了“慈善”基金,并逐步培养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才和先行者。1927年成立“美国智囊团”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以“中国通”为成员,如国会图书馆的恒慕义(A. W. Hamel),耶鲁大学的东方史名誉教授赖德烈(K. S. Laturette),为其中的主将。赖德烈撰写的《早期中美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 1784—1844*)于1917年出版。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前后,美国学者杜威来华讲学,大讲实用主义,交流学术,起到了沟通中美文化的作用。1930年以后,美国史学会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才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随即出现了早期的中国通(China Hands)与智囊团。

同时美国还以“庚子退款”之名,在中国创办大学,出版书刊,以适应其文化扩张政策的需要。如创办清华大学(它的前身是1909年创建的游美学务处,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班)、燕京大学、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并在各大城市创办中等学校。在中国海关总务司供职 34 年的马士(H. B. Mores)，撰写有《中国货币》、《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东印度公司中国贸易记录》、《中国行会论》等。他的代表作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其中引用的史料是根据海关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随后还出现了进步记者的报道与见闻，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中说，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毛泽东称它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的情况的书。”又如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

四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

转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阶段(是“历史学和中国学平行发展、自觉成熟与合并的阶段”，也是“历史知识信念的复兴”和“富有生气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美国有几十所大学先后创建起几十个研究中国的中心，分工合作，进行初步的研究。其中资金雄厚，人才集中的就有十多个。当时美国的 13 所一流大学中，有 6 所开设有“东方学”。1942—1945 年间出版的 50 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有 20 部是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其中以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著的《中国通史》影响最大，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还是美国大学中最常用的读本。他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历史》，是用基督教徒的观点，专门用外文资料来研究中国史的专著。作为一个资深学者，赖德烈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序言中坦率地承认：他“出身西方，因此不可避免地以中国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革命，而不会像一个中国人那样

看”；并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无偏见地写历史。”他曾获得 17 个学位，其毕业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早期中美关系史》。他曾到过长沙等地，1947 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美国的中国学如此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是有其历史背景与现实目的的。美国人最富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求实精神，他们多是求实派、实用主义者。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亚洲需要靠中国去击败日本，所以必须要研究中国。如这一时期在大专院校举办的有关短训班上，安排了“军区民事部国外地区和语言课程计划”。1941 年美国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组织了“远东协会”，出版了《远东刊》。1948 年有 200 多名中国学专家参加了“远东协会”的年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要变中国为它的仆从国，也需要研究中国。又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派出了不少人来华工作，这就有助于他们学好汉语，接触资料 and 实际考察，从而促进了“中国通”的成长。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等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来华考察，回国逐步成为专家的。故可以说，美国是从组织上、思想上、资金上和资料上，都做好了培养出一代专攻中国近现代史的必要人才的准备，并逐步形成“现代实用学派”。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叙述了他在华的所见所闻，探讨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并号召要重新加紧研究中国。德·贝尔的《1919—1949 年中国的内战》，则反映了他们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现代中国的倾向。

五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进入了深入了解
“敌情”，以便制定战略与策略的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除研究机构增加外，研究经费也